



编者按

构建中国经济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回应时代课题的重要探索。围绕这一核心议题,专家学者从市场实践、实现路径等多个维度,深入探讨了中国经济社会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既回顾了学科发展成就,也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为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丰富视角与学理支撑。

市场实践的经济社会学探索

符平

中国社会学自学科重建以来始终关注市场现象,深入探索市场实践的嵌入性和社会建构,涌现出一批高质量成果。

产权与市场实践。对于市场中的产权现象,社会学并未因循西方经济学的标准理论,而是从实践出发考察产权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被称为“产权的社会视角”。该视角的第一个方向是从中国的实践中提炼出有别于经济学的产权概念,并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假说。在这一方向上,刘世定使用“占有”概念,并从占有制度的三个维度分析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周雪光提出“关系产权”概念分析乡镇企业的合法性建构,还有学者提出了“社会合约性产权”“复合产权”等标识性概念。第二个方向是“产权的社会建构逻辑”,具体考察产权的界定过程,理解行动者的动机和价值取向,以此来分析产权如何通过行动者的互动而自发建构,并分析互动过程受到何种社会规范或公平原则的制约。

政府与市场实践。在政府与市场实践的关系方面,社会学侧重于关注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关系特征、互动机制及其对市场或产业的影响。刘长喜等认为,中国市场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政府投资驱动型特征,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化和金融化等方式突破了条件约束,实现了投资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冯猛基于东北的调查揭示,地方衡量政绩的制度结构约束并激励了基层政府通过引领性干预打造典型产业。相关研究指出,地方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不同互动关系建构了不同的产业组织过程、市场结构、政策利用机会和创新能力,从而有力塑造了地方产业的竞争优势,而地方的产业优势是在“引领型市场体制”中逐渐显现出来的。

关系与市场实践。关系是观察中国市场实践的重要切入点。边燕杰和张文宏对中国就业市场的研究发现,由亲属和朋友所构成的强关系不仅在再分配体制下的职业流动中发挥作用,且在双轨制时代和转型时代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汪和建立足中国市场实践的三个主要特征即自主经营、网络生产和派系竞争,提出了一种“自我行动的逻辑”的理论。王水雄建构了镶嵌式博弈的理论模型,依据不同市场的典型案例分析了转型期中国的市场秩序问题。李林艳建构了针对关系的本土理论框架,发现市场中的关系既可以充当一种正式规则的转换机制,也能够配置市场内部的经济资源。

文化与市场实践。文化为市场实践提供一种共同理解,是市场秩序形成的前提条件。一些研究探索了塑造市场过程、对市场结果造成影响的文化因素,分析文化影响企业行为、市场运作和产业发展的路径。王宁指

出,城市政府吸引高新技术公司要考虑人才的舒适偏好或人才的地方消费主义观念。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地方消费主义构成助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社会一文化”力量。陈纯菁从文化的多重互动模型出发揭示了文化在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形成和成长阶段所扮演的角色。梁波等发现,一些领域的中小型创业仍然与家和亲密关系紧密相连,通过“家计”促成合作共识、“家爱”提供情感支持、“家识”帮助应对风险,家、亲密关系与创业经营之间保持了适度的联系和平衡。

在现代社会科学的语境下,市场是当今世界最广泛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制度。市场不但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市场建设还是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推动着决策者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断探索市场更好的运行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在最高层的表述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从“调节”作用到“基础性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的转变,反映出市场在中国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提升。

在大变迁时代,市场本身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市场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既是中国市场制度建设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的结果。从理论上看,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市场制度的一种理想类型,对于深化、拓展社会学关于市场制度多样性、市场形成路径以及市场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层面,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指导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的纲领,其制度目标是通过建构统一大市场提高市场效率、激励创新并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建构新时代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体现了国家对国际新形势和经济新趋势下市场体制和市场运作机制的深刻认识,作为一种市场制度形态也沿袭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

中国社会学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实践的独特路径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标识性的理论概念和观点命题,为理解中国市场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提供了丰富多元的视角。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建构和整合,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融合,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内容,特别是加强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研究,从市场的鲜活实践中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为中国的市场制度完善和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思想引领力。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经济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

李国武

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者坚持经验研究与理论构建并重,既通过细致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定量数据来深描经济社会领域发生的重要变迁和主要议题,又努力基于中国经验凝练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呈现出鲜明的发展特点。

第一,坚持经验为本。中国经济社会学界始终坚持从实求知的优良传统,展现出敏锐的问题意识、开阔的学术视野,进而触及和探究了丰富的研究议题。近些年不仅在产权、企业、产业、市场、消费和劳动等长期耕耘的传统领域有新进展,而且积极开拓对平台经济、金融市场、企业跨国经营等新兴领域的调查研究。在宏观层面上,中国特色政商关系与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住房制度变迁和居民财富积累机制、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产权变迁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数字化、金融化和全球化新态势等议题都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中观层面上,涌现出很多以地区、行业或组织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比如,平台企业政府事务部门专门化、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机制及其影响、单位制企业改制和破产过程中的产权重构、乡村产业发展中的社会文化基础、银行业的变迁和网络借贷行业的治理演变、劳动力体制的区域差异等。在微观层面上,研究者不仅注重对行动者各种经济行为背后的伦理观念、意义体系、合法性基础的揭示,而且对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合作、竞争、角力、协商等互动和博弈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第二,注重理论导向。中国学者们立足本土经验对西方理论开展反思性的对话,展现出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在对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解释中,学者们强调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序社会协同机制的重要性,以及地方性社会文化的作用。在研究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和单位制企业产权变迁中,学者们提出“关系产权”“追索权”“身份产权”“产权体制”等概念来理解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和重构实践。还有学者提出“巢状市场”的理论来概括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之间联结的供需匹配类型。有些学者分别从“社会建构论”和“技术红利共享”角度解释分享经济的兴起。有学者提出“双重结构”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物质供给和文化习俗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还有一些学者从行为和互动分析角度推动经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比如,“利益一规范”双重博弈理论、社会比较理论、偏好改变的动态模型等。

第三,探寻底层逻辑。中国社会学界愈发主动地从自身的历史、制度、文化等源流来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底层逻辑。国家、家庭和关系这三种“元制度”及其相互关联

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众多研究者在不同的研究议题中所强调。比如,在产权的界定和重构研究中,学者们不仅分析了农民与地方政府、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而且探究了不同行动者争取权益的多重合法性基础和社会关系基础。在乡村产业发展研究中,学者们既关注到政府自上而下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作用,也揭示了乡土社会和个体家庭自下而上的内生发展动力,以及内外有别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伦理对经济交易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学者们不仅考察了人际关系网络在供需匹配和市场交易结构塑造中的作用,也分析了地方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力量在劳动力市场运行和管理中扮演的角色。在消费研究中,家庭代际关系、关系运作、政府的基础设施供给等因素都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展望未来,对于经济社会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学界同仁仍需努力。首先,要进一步重视理论构建的累积性和系统性。当前学界的理论研究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碎片化、为经验套理论、以概念代替理论等倾向,缺乏对学科基础性概念的界定,辨析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概念间的逻辑关联,结果导致理论构建的累积性和系统性不强。虽然中国经济社会学一直重视对国家、家庭、关系、伦理、文化、制度等概念和理论的研究,但这些概念和理论不仅是用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的工具,实际上它们本身也是需要进一步被分析的对象,需要构建更基础的概念来分析它们。其次,要进一步推动基于行为和互动分析的经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结构一制度”分析取向的拥趸要多于行为分析取向者,研究者们更喜欢直接用关系、结构、文化、权力、制度等概念来解释经济现象。这种整体主义取向的理论有其知识盲区,对宏观现象的解释缺乏微观行为基础,看不到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博弈结构对宏观结果的影响。虽然在经济社会学的行为分析中,确实有必要引入行动者内隐的认知观念和伦理规范,但也要警惕陷入过度社会化的泥潭,即过于强调行动伦理和认知观念的影响而忽视行动者的理性选择。最后,要进一步加强对有一般性意义的基础理论的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非只强调特殊性而忽视共通性,也非自说自话停止对话交流。如果不与其他国家进行制度上的比较和理论上的交流,就无法搞清楚自我与他者的异同。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理论的重要价值就在于找到更基础的分类标准和分析性概念,把不同类型的结构、制度和观念置于统一的架构下来定位和理解。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教授)

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双重奇迹”

王庆明

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与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相辅相成,构成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典范。如何在理论上进一步提炼“双重奇迹”的中国范式和中国理论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题中之义。

以民生为本的社会建设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多元利益群体不断涌现,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与治理的统一性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张力,给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带来了很大挑战。中国通过以民生为本的社会建设,一定程度上弥合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化,避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注重社会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是化解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结构失衡的重要切入点,是对一味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思路的矫正。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高质量发展是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平衡不充分挑战的根本途径。在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海内外很多研究者将此称为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并试图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层机理。与此相关联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体制是融合了传统的再分配机制和新型的市场机制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独特社会结构。对于这种社会结构和制度形态,一些社会学家用“社会奇迹”或“体制奇迹”来表达,并强调是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密码。“经济奇迹”与“社会奇迹”的并存互融是中国社会转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东欧、中欧等曾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特征所在,亦是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共同富裕是消解两极分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机制

党的十九大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正是阻碍我国实现2035年发展总目标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近年来,中国在脱贫攻坚、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推进共同富裕和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取得了重要成就。从全球主要现代化经济体的分布格局看,欧盟有4亿多人,美国有3亿多人,日本有1亿多人。而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走向现代化,东方和西方现代化的版图将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与此相关联的是,世界社会科学的认知图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重要背景。

激发社会活力是确保经济下行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的社会稳定奇迹与经济增长奇迹的相互作用构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一场罕见的巨大社会变迁。中国改革开放后两个重大转变:一个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即经济体制变革转轨的过程;另一个是从农业社会、乡村社会、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国社会的两个重大转变及其相互融合构成中国社会治理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将“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新时代我国发展的“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之一,确保社会和谐稳定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虽然经济增长趋缓,但社会结构转型并没有因此而降速,原本被经济高速增长遮蔽掉的社会矛盾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逐渐凸显,特别是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发展不均衡引发的地域结构矛盾,农村与城市发展不均衡引发的城乡结构矛盾,不同群体收入差异引发的两极分化的阶层结构矛盾等,这些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掣肘经济增长。多重结构矛盾对中国高质量发展构成挑战,而稳定的环境能够激发社会发展活力,提振消费信心、助力经济发展。因此,在全球经济低迷、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背景下,只有创造稳定良好的社会秩序、激发社会发展的新势能,才能实现中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性的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智力支撑。

【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本文为天津社科基金“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TJW25-8)的阶段性成果】

构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

张文宏

中国式现代化为理论创新注入了强大动力,为学术繁荣开辟了崭新空间。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理论创新,如何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彰显学科价值,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是摆在我面前的重大课题。

时代变迁与学科使命:经济社会学发展的新机遇与新要求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重大判断不仅标志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更为经济社会学研究提出了全新的时代课题。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独特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实践内涵,为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空间。

传统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主要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难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深入挖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形成能够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创性理论成果。

同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学确立了根本的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经济社会学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做学问的学术品格,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在回应人民群众对更好教育、更稳定工作、更满意收入、更可靠社会保障的期盼中彰显学科的人民性和实践性。

核心议题与研究前沿: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学阐释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需要重点关注四个核心议题:

首先是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基础与动力机制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这一转变不仅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更是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深刻调整。经济社会学需要深入分析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条件,特别是要研究社会结构转型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抓手,分析教育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社会要素如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互促进、相互支撑。

其次是共同富裕的社会实现路径与制度安排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为经济社会学提出了重大的理

论和实践课题。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更多关注效率问题,而经济社会学则重点关注公平问题,研究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我们需要深入分析收入分配的社会机制,探讨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社会基础,研究如何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等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成果分享。

再次是新发展格局的社会条件与文化支撑研究。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需要经济政策的支撑,更需要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底蕴。经济社会学需要研究消费升级的社会动力机制,分析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社会条件,探讨如何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同时,要深入研究进一步开放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分析中国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理念如何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文化支撑。

最后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要素与结构变迁研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社会结构的相应调整。经济社会学需要研究科技创新的社会条件,分析人才培养、知识传播、创新文化等社会要素如何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探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如何重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学科价值与社会贡献:经济社会学服务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在促进高质量发展方面,经济社会学要充分发挥揭示社会机制的独特作用。经济社会学要深入分析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条件和动力机制,研究如何通过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关系优化、社会制度完善来支撑和促进高质量发展。要特别关注创新驱动发展的社会基础,研究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文化建设等社会要素如何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经济社会学要为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案。共同富裕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文化进步等多个方面。我们要运用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理论,深入分析收入分配的社会机制,研究如何通过教育公平、就业充分、社会保障完善等途径,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经济社会学要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引领全球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我们要深入总结中国发展的独特经验,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特别是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发展倡议等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开展跨文化、跨制度的比较研究,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